

大家小集  
梁启超集

梁启超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花城出版社

大家小集

梁启超集

梁启超 著  
郑大华 王毅 编注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  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梁启超集 / 梁启超著; 郑大华, 王毅编注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0. 10

(大家小集)

ISBN 978 - 7 - 5360 - 5931 - 3

I. 梁… II. ①梁…②郑…③王… III. ①梁启超 (1873 ~ 1929) — 文集 IV. ①B259.1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0888 号

丛书策划: 肖建国 秦颖

责任编辑: 丁放鸣 邓裕玲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 林露茜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

(广东台山市北坑开发区)
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4.25 6 插页

字 数 320,000 字
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5000 册

定 价 28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9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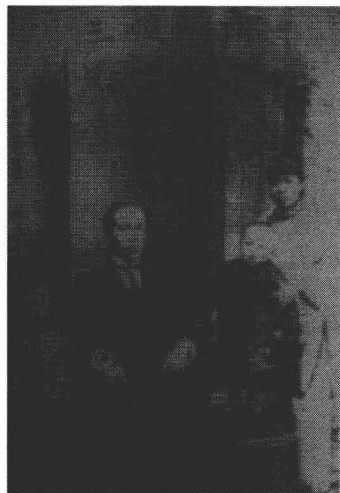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1899年的梁启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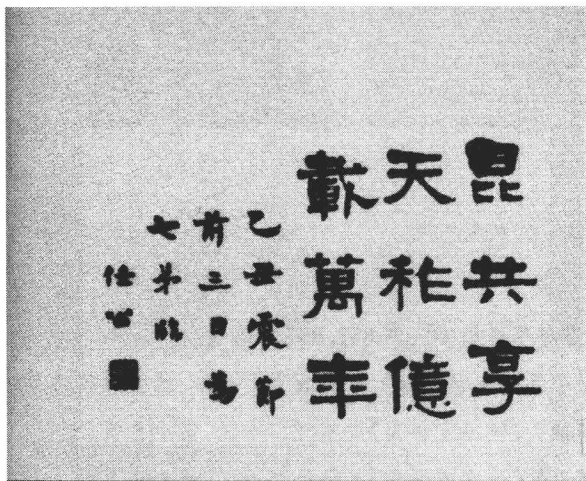
“双涛园群童”1908年摄于日本



梁启超与思顺（右一）、思成（左一）、思永（右二）合影。1906年摄于东京



梁启超少年读书处（广东新会“文昌阁”）



1925年梁启超为七弟梁启雄题签



梁启超 1902年摄于加拿大温哥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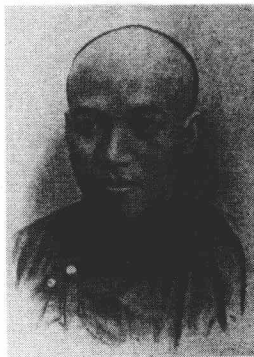
梁启超 1900年摄于澳大利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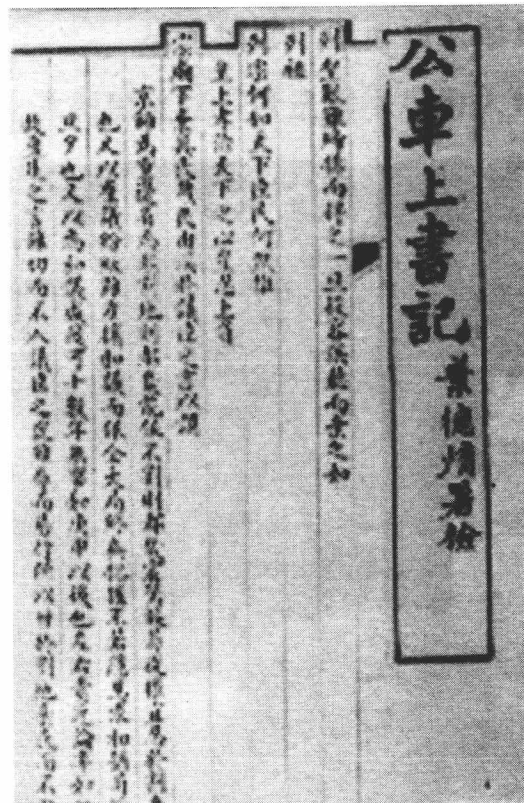
谭嗣同



康有为



梁启超



公车上书记

鶴稿

自題小像字思跋

中區安睡，  
 也還健飯，  
 忙處此心閑暇，  
 朝來點檢鏡中顏，  
 好像比十年前胖些！  
 天涯游子，  
 一年長夢，  
 多少痛，愁，驚，怕！  
 閒處運法百濕存：  
 夢：裏好尋媽。

歌仙与甲来注诗意

梁启超手迹



由梁启超题签的章太炎《旭书》初刻本封面



1910年梁启超和汤觉顿流亡日本时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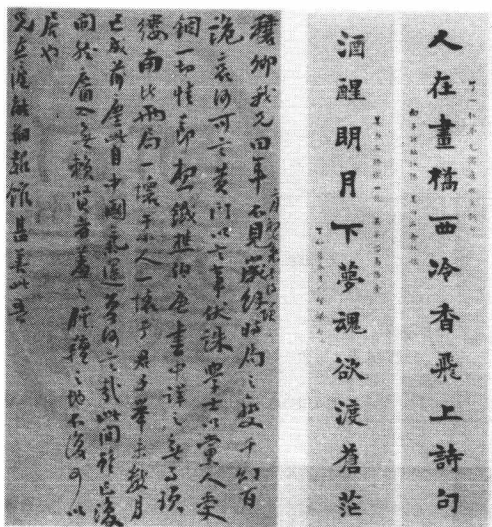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梁启超抱着2岁的思庄与3岁的思忠，1910年摄于日本



50岁的梁启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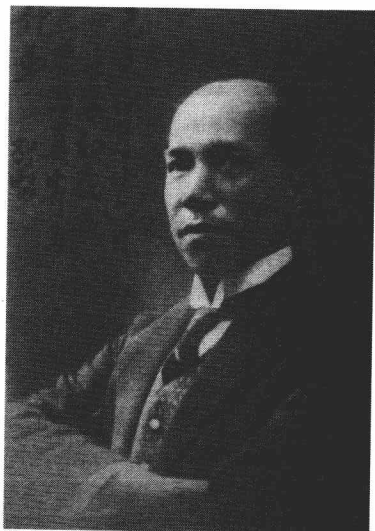
梁启超书法



梁启超和思永（右）、思达（左）摄于上世纪20年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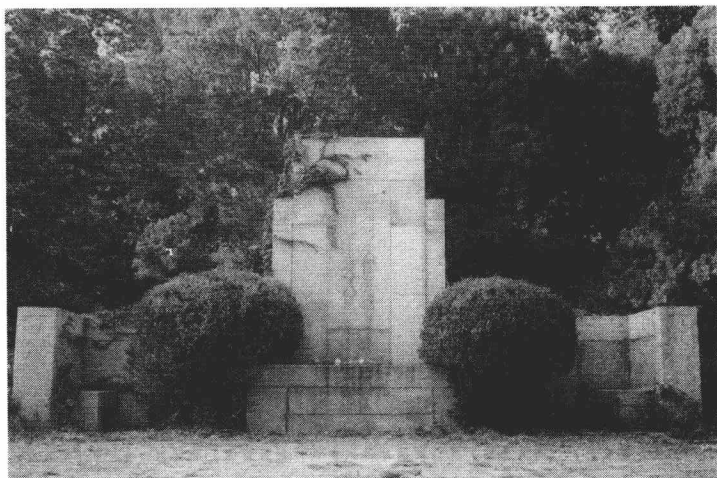
1924年，梁启超接待来华访问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



寄二弟梁启勋。梁启超47岁时摄于巴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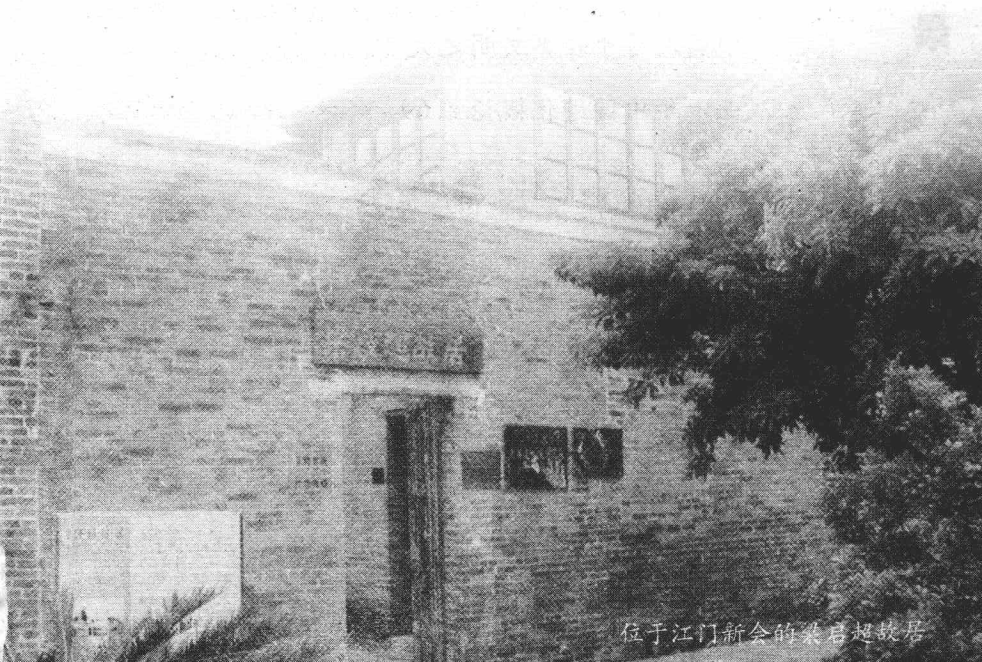
梁启超 56 岁时留影，这是他一生最后一张照片，曾寄给大孩子们每人一张



位于北京植物园的梁启超墓

大家小集

梁启超集



位于江门新会的梁启超故居

## 导言

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是中国士大夫们一生追求的“三不朽”。就这“三不朽”而言，中国近代史上恐怕很少有人能与梁启超相提并论。在立功方面，他参与戊戌变法，领导立宪运动，倡导政党政治，投身护国战争，反对张勋复辟，为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贡献了毕生精力，居功甚伟；在立德方面，他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为追求真理，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，与时俱进，一生大多数时间都走在时代的前列，其政治思想和主张虽然流质多变，但爱国之志、报国之心、救国之情则始终如一，无论私德公德都可为人楷模；在立言方面，他的“新民说”影响了整整一代人，他提出的“史界革命”、“文学革命”、“小说界革命”和“诗界革命”的主张也产生过广泛影响。他还身体力行，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整理和探讨中国固有的旧学术，推陈出新，不仅为中国的思想学术开创一代新风，而且在史学、文学、哲学、经学等众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，是“百科全书”式的学者，一部《饮冰室合集》，洋洋洒洒千万余言，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。

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，也是梁启超走上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开始。早在戊戌变法开始之前，梁启超就协助康有为编校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等书，为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制造理论依据。1895年4月，在甲午战争中被“蕞尔岛夷”日本打败的中国，将被迫签定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消息传出，群情激愤，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梁启超闻讯后，立即协助康有为发动“公车上书”，要求拒和、迁都、变法。上书虽因投降派和顽固派的破坏而流产，没有转呈到光绪帝手中，亦未能阻止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，但其内容则被广泛传抄印刷，流传很广，人们从中“渐知天下大局之事，各省蒙昧启开，实起于斯”。康有为从此确立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地位，而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，梁启超开始为人们所注目。“公车上书”不久，为推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，梁启超又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，发行《中外纪闻》，并出任强学会的书记员和《中外纪闻》主笔。强学会被清政府强行解散后，梁启超南下上海，任《时务报》主笔。《时务报》“以变法图存为宗旨”，内容以论说和译文为主，其中论说主要由主笔梁启超等人撰写。据统计，《时务报》先后发表论说120多篇，这些文章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，并从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军事等方面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批判，介绍和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、经济制度和民权、平等思想。加上梁启超“纵笔所至不检束”，“笔锋常带感情”，写出的文章“平易畅达”，“条理明晰”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具有很强的感染

力。因此，《时务报》出版不久，即受到广泛欢迎，“一时风靡海内”，发行点由十几处增至一百多处，发行地区由沿海大城市逐渐扩展到云、贵、川、甘一些边远地区和潍县、沙市、瑞安等中小城镇，销售量最多时达到17000多份，“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，举国趋之，如饮狂泉”。1897年冬，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，来到长沙，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，并亲定《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》：一曰立志，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己任，为救亡而献身；二曰养心，要求破苦乐，破生死，破毁誉，威武不屈，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；三曰治身，忠信笃敬；四曰读书，要求“上下千古，纵横中外之学”；五曰穷理，注重思考和观察；六曰学文；七曰乐群；八曰摄生，锻炼身体；九曰经世，探究富旨之道；十曰传教，宣扬孔子精神。他还经常在课堂上或札记中向学生灌输民权思想和反清思想，把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、王秀楚的《扬州十日记》秘密刊印，加上案语，在学习中广为散发。他鼓励学生勿为功名所累，当以国家民族为念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。时务学堂开办后，共招生三次，总计招收学生200多人，其中不少成了维新运动的骨干。1898年初，梁启超再次应康有为之召，北上到京，和康有为一起，发起成立保国会。“百日维新”开始后，他被光绪帝委任为六品衔，办理译书局事务，先后亲自或代人上书多篇，提出一系列变法维新的具体主张。由于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重要作用，人们常常将他与康有为相提并论，合称为“康梁”。

梁启超在积极参与“公车上书”、组织强学会、成立保国会和“百日维新”等一系列政治活动的同时，还以他的如椽之笔，写下了大量的宣传维新变法的文字，其中影响最

大的便是我们节选的《变法通议》一文。该文共13节，分43期在《时务报》上连载，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。首先，他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合理性和迫切性，认为古今中外，万事万物，“凡在天地间者，莫不变”，“藉曰不变，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”。人类社会也是一样，“上下千载，无时不变，无事不变，公理有固然，非天之为也”。“法”同样要变，“法行十年，或数十年，或百年而必敝。敝而必更求变，天之道也”。既然“变者，古今之公理也”，古今中外没有不敝、不变之法，那么，我们就应该顺从事物发展的规律，不断变法革新，而不能因循守旧，泥古不化。针对封建顽固派所散布的“祖宗之法不能变”、变将祸乱国家的守旧思想，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指出，清朝建立后曾“变服色”、“变文字”、“变历法”、“变赋法”、“变役法”、“变刑法”，在各个方面都“变”了“前朝之法”，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在清朝自己建立后的二百多年中，也在不断“因时制宜”，多次“变本朝之法”，清入关后的制度对清入关前的制度有所改变，鸦片战争后的制度又对鸦片战争前的制度有所改变，“上观百世，下观百世，惟本朝为善变”。既然“本朝”的“祖宗”以“善变”而著称，今天讲“法祖”，就应“法祖宗之意”，维新变法。否则，因循守旧，“泥祖宗之法”不变，则是“戾祖宗之意”，是以“善变”而著称的“祖宗”的不肖子孙。他还进一步指出，能否遵循事物进化的原则，不断变法革新，这是一个国家强盛衰弱的重要原因。比如，印度是千年古国，因“守旧不变”，成了英国的殖民地；土耳其地跨三大洲，立国历千年，也因“守旧不变，为六大国执其政，分其地矣”。而与印度、土耳其相反，俄国虽“苦寒之地”，并长期受“蒙古



铃辖”和沙皇的残暴统治，“民气凋丧”，但自彼得大帝“游历诸国”，“归而变政”，国势日益强盛起来。日本也是一样，虽曾经遭受欧美列强的入侵，“国几不国”，但“自明治维新，改弦更张，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，割我台湾也”。故此他得出结论：“开新者兴，守旧者灭；开新者强，守旧者弱。天道然也，人道然也。”

梁启超不仅反对守旧，要求变法，而且主张“大变”、“全变”，并对只主张“变器”、“变事”，但不主张“变政”、“变法”的洋务派提出了批评，认为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所以失败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效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洋务派“变法不知本源”，只求“补苴弥缝”，而不知“全变”、“尽变”。他曾很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之于一座千年巨厦，说此巨厦已“瓦墁毁坏，榱栋崩折”，眼看即将崩塌，而屋中之人，有的则“酣嬉鼾卧”如常，“漠然无所闻见”；有的则“睹其危险，唯知痛哭，束手待毙，不思拯救”；有的则“补苴罅漏，弥缝蚁穴，苟安时日，以冀有功”。他们虽然“用心不同”，但后果一样，“漂摇一至，同归死亡”。这里所谓“酣嬉鼾卧”者，指的是最愚昧无知的顽固派；“唯知痛哭”者，指的是那些空谈“尊王攘夷”、“夷夏之辨”的清流派，其中不少人属于顽固派的阵营；“补苴弥缝”者，指的是洋务派。梁启超认为，善于居住的人，面对即将倾覆的巨厦，则必须“去其废坏，廓清而更张之。鸠工庀材，以新厥构”。这样才能保证它不会因“风雨猝集”，而突然崩塌。所以他反复强调：不变法，中国必然会蹈波兰的覆辙，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；不尽变法，“非徒无效，只增弊耳”，中国也逃脱不了被瓜分的命运。他的《变法通议》，其中一篇《论不变法之害》，主要批判的是不